

新时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识形态逻辑及其实践路径

肖唤元, 冯思苑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强国建设、助力民族复兴的关键举措,内蕴了深刻的意识形态逻辑。在意识形态比较逻辑上,中西方文化体制机制在文化根基、制度形态及改革路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意识形态价值逻辑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南针、黏合剂和守护盾,起到了引领文化发展方向、凝聚社会共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作用。在意识形态双向互动逻辑上,新时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驱动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引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掌舵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航向的灯塔,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文章建议在意识形态层面推动新时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筑牢理论根基,强化思想引领;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加速传播效能飞跃;要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健全综合治理体系;要繁荣文艺创作生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蓬勃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意识形态逻辑;中西文化体制机制比较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5.04.007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5)04-0063-08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1],同时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进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新时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强国建设、助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举措,内蕴了深刻的意识形态逻辑。深入理解和把握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识形态比较逻辑、价值逻辑和双向互动逻辑,对于领会和把握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路径和具体举措、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识形态比较逻辑

中西方文化在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来源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本质上是文明路径的分野。中国坚持以“守正创新”来传承文明连续性,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妄图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以“封堵打压”来维持文化霸权体系。两种模式的互动将深刻塑造全球文化秩序。中国要在开放中强化文化主体性,警

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成为破解意识形态冲突的可行方向。

(一)文化根基:中华文化的道统情怀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分野

中华文明的向心性发展格局与西方文明的多元共生特质,本质上是由各自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源流共同塑造的,这种差异也奠定了两大文明截然不同的演进路径。中华文明自三皇五帝肇始,经夏商周三代早期王权体系演变,至春秋战国思想激荡、学派林立,最终由秦汉实现政治统一,逐步构建起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枢纽、向四周延展的向心性文明发展格局。在文化演进过程中,早期社会呈现出自然崇拜的显著特征,随后逐渐抽象化为对“道”与“易”的哲学思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裂变与思想多元交融催生众多学派,秦朝以法家理念完成政治整合,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正统,道法逐步成为帝王治国之术,最终形成道儒法三家思想交融的格局。由此追溯,中华文化的本源可归结为从上古自然崇拜向大道真理探索的哲学演进。而对西方文明而言,其文化源流更为复杂。从地理因素看,西方文明以欧洲大陆为核心向外辐射。相较于东亚大陆平原地带的地理连续性,欧洲大陆因山脉、河流

[投稿日期]2025-03-09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联经济社会发展重点课题(编号:2025lslzdk-004);辽宁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编号:JG24DA006);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编号:DUT24RW211)

[作者简介]肖唤元(1988—),男,辽宁阜新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纵横交错,地形呈现出高度破碎化特征,阻碍了文化核心区的形成,反而催生了多元文化在欧洲大陆的交融共生。从文化基因来看,西方文明呈现出多元源流的典型特征,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理性精神、基督教的信仰体系、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同时,西方文明也借鉴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优秀成果,最终形成了多源交汇、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

中西方文明在历史源流上迥然不同,二者在文化内核上也展现出显著差异。中华文明以“道”为核心,强调“理”“仁”“和”的有机统一。儒家以“礼”规范社会秩序,法家以“法”强化统治权威,道家以“道法自然”调和矛盾,共同服务于大一统的治理体系。这种“道统”特质也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始终着眼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愿,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肩负着赓续中华文脉、实现文化繁荣的使命。同时,我国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倡导“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求着力“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1]33}

因此,我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加注重守正创新,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下渐进调适。而西方文明的多源性使文化内涵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早期表现为理性主义精神与宗教信仰观念的融合与博弈,这一点在经院哲学的发展历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经院哲学家们投入大量精力,运用严谨的逻辑论证体系构建关于上帝存在的哲学证明。直至文艺复兴运动前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思想才在思想层面发生转变,确立了以理性和科学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同时注重个人发展,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由此还产生了包括个体奋斗意识、自由民主精神、扩张征服意识、金钱崇拜意识,以及功利价值理念等文化精神。总的来说,西方文明长期存在着理性与信仰、个体与群体、世俗与宗教的多元对立,整体上已然构建起一种内部多元力量相互角力、彼此制衡的形态。这种多元性使西方改革更依赖竞争性张力,而竞争性会使个人主义横行。比如,自由市场凭借其内在的竞争逻辑驱动文化产业化发展,追求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却忽视社会效益,从而造成社会关系的疏离。

(二) 制度形态:集中统一与分权制衡的体制博弈

在中西文明演进的长河中,制度建设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具体制度形态却展现出鲜明的文化

差异性。自夏商周以来,中华文明逐步确立了以王权为核心的制度范式。其中,君主居于权力中枢,群臣百官则环绕辅弼,外围更辅以五服、九服等藩属体系,形成极具东方特色的同心圆制度结构。这种制度形态以“道统”为哲学根基,既以“道”为最高价值准则,又以“君”为制度枢纽,形成“君权天授”的合法性基础,文化与制度层面的同心圆架构形成深层呼应。为保障制度体系的稳定运行,逐渐发展出以《周礼》为代表的制度典章体系,这一体系经由文化传统的反复确证,最终形成了“礼法合一”的制度形态。自周朝确立制度形态后,历经秦朝大一统格局的深化与巩固,中华文明传统制度形态已进入臻于成熟完备之境,逐步形成文化与制度高度同构、统一集中的制度架构,在新时代突出地表现在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顶层设计,以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战略目标,强调要“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2]19}。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着力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文艺创作生产引导机制,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扎实推进,“四季村晚”“百姓大家唱”“全民广场舞”等活动越来越受欢迎,一批批充满时代感、家国情怀的文艺作品深受观众喜爱,群众文化活动参与度不断提高。

鉴于西方文明的多源性,尤其是在理性主义思潮、基督教传统以及商业文化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加之西方社会看重法治对王权的约束和规范,西方的君主阶层始终未能掌握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同时,西方依托市民社会与分权制衡逻辑,其政治强制效能的发挥相对有限。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强调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渗透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而非直接进行政治强制。因此,西方的文化治理更多依赖市场机制与非政府组织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持续发展。这种自由市场的模式强调竞争和创新,注重经济效益的回报,能够充分激活文化产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文化资源分配效率。但由于西方行政权力相对薄弱,政府地位处于弱势,其职能被进一步削弱,致使文化体制中市场治理模式和治理决策存在短视和拖延的问题。同时,西方文化体制下的文化产业本质上由私企主导,企业以盈利为目的,造成基层民众公益性文化需求被忽视。此外,由于西方文化体制市场化程度较高,文化产业经营相对独立且业态多元。这种高度市场化的运行模式,使得社会文化产业的运行完全取决于利益集团间的博弈,其结果必然使整个文化体制发展模式

被资本集团主导和操控。

(三) 改革路径: 守正创新与文化霸权的战略角逐

西方公共文化中蕴含着征服和占有的倾向。新航路的开辟使西方国家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 西方国家为掠夺财富与资源, 长期与其他文明国家处在竞争和敌对的状态。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着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大力输出其价值理念,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垄断和打压。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逻辑为核心, 这种资本逻辑不仅贯穿于经济领域, 而且渗透至文化领域。西方通过资本逻辑将文化符号商品化, 借助跨国公司和话语霸权实现全球文化输出, 加速了西方文化殖民进程。这种文化殖民实际上是西方推行改革和扩张的必然产物。一些西方国家依托传播技术优势与话语主导地位, 通过文化工业体系系统性地宣扬其意识形态理念。将“自由”“民主”“平等”包装为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准则, 同时将“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等消费主义主导的生活模式塑造为现代化生活的理想范本。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全球文化传播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通过意识形态的隐性渗透加强其价值观对他国的影响力, 以巩固其文化霸权地位。

面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打压与渗透,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 更加强调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重要性, 以及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 又要为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 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3]401}。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中国始终坚定文化自信, 强调要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通过非遗保护、文化传承不断强化文化认同。《黑神话: 悟空》以游戏形式输出传统文化, 既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回应, 也是主动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的策略。进入新时代, 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已经从简单的“够不够”向“好不好”转变: 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 不仅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而且还能创造出显著的经济效益; 强化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不仅能满足民众的基本文化需求, 而且还能大幅提升国民素质。公众参与强调要“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同时还要“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1]33}, 通过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地方性法规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建设。建立

一套收集和反馈群众文化需求的机制可促进“群众点单”与“政府买单”的有效衔接。数字化技术的利用可提升各级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 从而增加服务的多样性和精确度, 使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识形态价值逻辑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南针、黏合剂和守护盾, 起到引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正确航向、凝聚社会大众广泛共识、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重要作用。

(一) 引领方向: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南针

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 发挥着引领社会方向的重要作用, 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马克思主义认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178} 意识形态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统治阶级能够利用制度改革夯实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化统治, 从而提升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使社会成员更加认同和接受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时代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4} 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密团结起来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价值观在现阶段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稳定为价值遵循, 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从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法律和规章制度, 到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促进理想信念教育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到促成立法保护英雄烈士、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以及完善功勋荣誉表彰体系, 党和国家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引领文化建设, 旨在更好地构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注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 注重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向的一致性,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

(二)凝聚共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黏合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5]31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引导社会成员树立共同体理念,鼓励社会成员朝着共同的理想信念迈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全体人民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得以深入推进的重要动力。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关键举措。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将坚定“四个自信”作为核心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做到依靠人民、围绕人民、服务人民;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极大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供给向高质量转变,创造出更多反映人民精神世界、满足时代主旋律的优秀文化产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核心在于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完善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民众、指导实践的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推动媒体深度融合与发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清除不良风气,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上紧密团结在一起。

(三)保障安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守护盾

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良好的舆论保障,要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切实维护新型领域安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6]155}。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论的扩散和蔓延,一方面通过对文化市场的规范和监管,确保文化产品和配套服务保障平稳有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意识形态领域

发生的各种安全事件进行及时预警和应对,切实保障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基础。筑牢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思想阵地,一方面要加强内部思想引导和教育,进一步完善常态长效的学习机制。这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优化理论宣传教育制度,建立实践导向的评估体系,确保学习内容能够切实融入日常工作并产生实际效果,致力于培养一支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务实创新、战斗力强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另一方面要防范和抵御外部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和破坏活动。“西方借助技术优势在数据库和模型训练中潜移默化地植入异质思想,并大量使用英语作为训练的数据基础”^[7],在网络空间炮制谣言,不断制造舆论危机。因此,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良好的舆论保障,一方面要进行网络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并遏制网络攻击渗透活动,研究网络斗争的特性和规律,采用恰当的战略战术,动员社会力量对错误观念进行批评和驳斥,另一方面要完善网络意识形态综合管理体系,强化网络空间治理,坚持依法管网、依法建网、依法用网的原则,健全互联网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共享成果的网络生态环境,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的综合治理效能。

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双向互动逻辑

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逻辑。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引领改革方向,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另一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能够有效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创新,不断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

(一)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新时代驱动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守正创新,“从宣传、思想、文化、网络等领域着手整治,牢牢掌握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8]。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1]6}。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能够有效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创新。具体来说,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能够有效巩

固与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加强文化阵地建设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影响力,而且推动了新闻媒体、网络文化、文艺创作等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体系、完善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监管机制就是确保各类文化产品和配套服务始终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要求,从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二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能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对实践的总结提炼和探索,可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和经验做法,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善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新时代,我国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式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备受青睐,“文博热”“夜校热”“村晚热”火遍大江南北。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紧跟时代新趋势、融入发展新理念、拓展文化新内涵,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等措施,公共文化服务更具时代魅力。三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能够有效提升意识形态传播效能。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加精准、高效、便捷。这些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不仅扩大了传播的覆盖面,而且增强了传播的影响力。此外,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能够加强国际传播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既要加强国际传播平台建设,提升文化传播品牌效应,又要充分借助数字媒体技术打造适合不同场域、不同受众的传播机制,实现精准化传播。

(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掌舵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航向的灯塔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把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作为中心环节,加快完善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9]作为文化建设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强调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强调要建立一支素质过硬、业务精湛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强调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和产业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等。这些目标不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

的要求,而且也体现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要求文化产品和服务配套设施必须紧跟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不断反映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和审美需求。改革成效被纳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之中,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真正受益成为衡量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党和国家通过完善政策措施和制度机制,可以确保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始终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和群众需求。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进一步激发了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投身文化创新的火热实践中。他们用文创唤起文化记忆,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认同,践行了用文创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和使命。优秀的文化作品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成果的重要体现。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作品,如电视剧《大江大河》《山海情》等争相涌现。这些文化作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反映时代旋律,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群众切实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受益,而且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识形态实践路径

(一) 理论领航:筑牢文化根基,强化思想引领

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必须抓好思想这个“总开关”。一是要坚持思想引领,推动政治理论学习真正入脑入心,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唯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才能不走虚、有实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工作体系,又要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理论武装力和意识形态鉴别力,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二是要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以其科学性和革命性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崭新的内涵和强劲的生命力。”^[10]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魂脉和根脉,是我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基石。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着力激发“两创”深层次发展活力,依托信息技术发展新态势,加快打造新型文化业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片展现出时代风采。三是要加强理论研究,推动文化创新。这就要鼓励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注重

理论研究,充分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断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实践创新深度融合,形成集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大众审美为一体的文化发展成果。

(二) 提质升级: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加速传播效能飞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1]33}“如果仅有优质的话语内容,而没有有力的媒体资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就极为有限。”^[11]因此,既要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又要完善内部激励扶持机制,从而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平台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一是要加快技术创新,推动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这既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媒体平台向网络化、社交化转型,又要进一步提升“内容+科技”融合程度,凸显媒体智能化、数字化战略定位,顺应全媒体时代智能化发展趋势。2023年7月2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推出“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发布了集智能创作、对话、检索于一体的传播大模型,满足媒体从业者多样化信息处理需求。二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媒体活力。这既要建立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一体化组织架构体系,深化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新型采编流程,形成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制造体系和全媒体传播链条,又要推动内容生产机制创新,加快实现内容采编分发机制的转型升级,打造强大的内容聚合生产平台,不断完善内容引入、媒体入驻、内容分发、审核把关机制。三是要用主流媒体引领舆论主战场,提升市场竞争力。这既要通过短视频助力文化传播,增强视听体验、推出差异化内容和服务等方式,着力提升用户体验的满意度,又要着力打造融媒体精品产业链,充分传承和发扬主流媒体内容、集合人才优势,不断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

(三) 制度保障: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健全综合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3]35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任务。“网络空间治理是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12]新时代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是要坚持党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为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各二级单位党组织要根据党委统一部署,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网络内容生产、安全督导、人才管理等工作,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网络风险研判预警机制,不断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监管力度。二是要构建系统完备的网络法规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发布实施,是我国依法治网的开端。我国网络领域立法现已制定出台150余部,基本形成以宪法为根本,以各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为依托,传统立法与网络监管相结合的网络法律体系。系统完备的网络法规体系的构建,既要进一步明确网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规范网络行为,又要建立健全网络联合执法机制,提升网络执法效能,加大对网络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三是要加强网络生态监管。这既要加大网络监管技术的研发投入,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监管效率,又要建立网络监管平台,打破部门壁垒,加强网络监管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作与信息共享,实现对网络活动的实时监测和预警,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网络监管合作,共同应对跨国网络犯罪和网络安全问题,有效提升我国网络监管的国际化水平。四是要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这既要深化网络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工作,加快健全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机制,又要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快完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打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

(四) 服务创新:促进文化创作的繁荣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2]56}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着眼于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使命,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繁荣文艺创作生态,推动文化蓬勃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是要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这既要建立健全促进文化创新创造的政策体系、制定完善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产业扶持、文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为文化创新创造提供良好的环境,又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推动文化产业与科技、教育、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还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营造积极健康、

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二是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要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进一步完善文化产品服务供给机制,推动文艺作品创作的多样化,避免雷同和重复的文艺生产内容,确保贴近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三是要培育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具体是首先要健全符合文化发展特点、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的选拔、培养和任用机制,其次要制订并实施文化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开展文化创新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再次要加强文化产业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产学研合作,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对接,最后要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为人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有效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五) 实践评估:成效分析与未来展望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新时代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举措。通过强化思想引领、推进媒体融合、完善网络监管机制等多方面的实践,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一是理论武装与文化自信协同推进,思想根基持续夯实。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健全从理论武装到教育实践的工作体系促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识形态鉴别力显著提升。在文化自信建设方面,我国依托“数字敦煌”“故宫元宇宙”等新型文化业态,构建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矩阵,“两创”活力持续释放。二是媒体深度融合成效凸显,主流舆论阵地扩容提质。以技术创新为引擎,全媒体传播体系加速构建。2025年2月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媒体大模型2.0”正式上线,其在文本、图像、视音频等多业态协同方面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智能化内容生产能力。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人,较2023年12月增长160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6%。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抖音、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日益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主流媒体在舆论主战场的引领力显著增强。三是网络治理体系迭代升级,数字空间法治化进程加速。我国已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150余部网络领域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为网络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2024年全国开展“清朗”专项行动,累计清理违法不良信息162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群组8万余个,有力净化了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营造了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的网络氛围。技术监管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了

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平台,中国网络安全团队通过安全数据库、网络空间测绘系统等技术实时监测,网络生态综合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四是文化创新与人才培育协同发力,创作生态持续繁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文化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安三万里》《只此青绿》等现象级作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黑神话:悟空》《哪吒2》等文化IP正加速走向世界。人才培育方面,我国实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计划”,人才创新活力充分迸发。根据2025年1月11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创新人才发展报告(2024)》,近3年来创新人才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为16.2%,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优势凸显。

综上所述,一方面,进一步提升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成效需要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深化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既需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又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与文化创新的结合,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持续完善网络监管机制,既要构建更健全的网络法规体系,提高网络执法效能,加大对网络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又要加强网络生态监管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另一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构建更适应全媒体时代的生产传播体系。这既要加强媒体内容建设,又要提高内容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上述持续努力,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将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完善,在推动发展中取得更大成效,从而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3]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7] 刘永志,史业达. 算法推荐技术应用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对策建议[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 版), 2025, 42(1): 68-76.
- [8] 王蕊, 赵磊. 同源互构: 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层次结构与协同互动[J]. 党政研究, 2024(1): 32-42.
- [9]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 [10] 仲昭慧, 王永贵.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巩固的理路与进路[J]. 江淮论坛, 2025(1): 5-12.
- [11] 张映彬, 张培高.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五大着力点[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3): 53-59.
- [12] 孙贺乾.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助推中华文明建设: 逻辑、机理与路径[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5, 37(2): 48-55.

[责任编辑 李 新]

The Ideological Logic of the Reform of Cultural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n the New Era and Its Practical Paths

XIAO Huanyuan, FENG Siyuan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Abstract: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is a key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natio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ation, and it is embedded with a profound ideological logic. In terms of comparative ideological logic,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ltural institutions of China and the West in terms of cultural roots, institutional forms and reform paths. In the logic of ideological value, socialist ideology is the compass, glue and guardian shield for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mechanism, and plays the role of leading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cohesion of social consensus,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On the logic of two-way ideological interaction, the reform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in the new era is the engine driv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y, and socialist ideology is the lighthouse steer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and the two are closely linked and inseparabl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in the new era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firm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strengthen ideological leadership; to promote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media and accelerate the leap in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to improve the network regulatory mechanism and sound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o prosper the creative ecology of arts and culture,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flourishing socialist culture.

Key Words: new era; reform of cultural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deological logic;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